唐代行卷的仪礼与过程研究

金滢坤 任占鹏

摘 要: 唐代举人行卷过程中有一定的礼仪和程序,虽因人而异,但基本环节大体一致。举人行卷,在准备卷轴、启之外,还需执刺、奉币,通常将四样东西一并投献先达。行卷过程大致分为请见、谢见、温卷和叙谢等步骤,每个步骤都有一定的礼仪和书启格式。文中重点对行卷中使用的刺(名纸)的演变和含义进行了考释说明,并对"温卷"内容和含义进行了重新探讨。唐代行卷的根本原因是省试以考试成绩与时誉相结合,举子通过行卷祈求先达为其延誉,提高时誉,从而获取科名,行卷遂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行卷大体对士族子弟有利,对寒素、小姓和落魄士族子弟不公。

关键词: 唐代;行卷;仪礼;过程;效果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6-0044-09

关于唐代行卷的问题,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比较具代表性的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唐代进士科举考试中行卷之风的由来以及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行卷下了定义[①]。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章《进士行卷与纳卷》[②]、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③]、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等论著[④],从不同角度对行卷的产生时间、行卷文体、行卷内容,及其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选题在前人基础上,主要就行卷创作、卷轴制作、投谒对象的选择、进行礼仪与过程和行卷效果进行探讨,以期复原唐代行卷的大致轮廓,分析行卷对科场和唐代社会的影响。笔者《唐代行卷过程研究——行卷的创作和制作》、《唐代行卷过程研究(二)——投谒对象的选择》两文已经对唐代举子行卷中作品的创作、卷轴制作和投谒对象的选择进行了深入探讨[⑤]。本篇重点对举子投谒的卷轴、启、刺和币等物品进行考释和说明,并对相关的仪礼和具体问题进行说明,以期复原唐代举子行卷的具体过程和仪礼,探讨举子行卷的效果及其与科举考试的关联。

收稿日期:2014-12-31

作者简介:金滢坤,男,甘肃白银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任占鹏,男,广岛大学综合科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29 页。

②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初版,2003 年再版,第 262-282 页。

③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22-236 页。

④ 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 69-87 页。

⑤ 《科举学论丛》,2014 年第 2 辑,第 1-8 页;《中国考试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52-56 页。

一、行卷仪礼与过程

唐代举子在选择好行卷对象之后，便投献卷轴。举人行卷遵照一定仪礼程序进行，整个过程大致分为请见、谢见、温卷和叙谢等步骤。北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杂录》云：

>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投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①

从宋初"袭唐末士风"一句来看，唐末五代行卷过程亦大致如此，举子行卷于先达要先投笺（启）、刺，叫请见，得到许可方可见面，献上卷轴；举子获得谒见之后，他日又要投启事即书启表示感谢，称谢见；数日后还要投书启，叫作温卷；若是举人得到先达、名公的称誉、书谢，还要上别裁启事，委曲叙谢。一次完整的行卷过程，前后需要笺一件，刺一件，卷轴一件，启事两件，别裁启一件。又据南宋项安世曾记述唐代行卷之极弊时，云：

> 王公、大人，巍然于上……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②

按照其说法，举子行卷极其谦卑，距离王公、大人之家门百步之外，就要下马，手捧"币、刺"，向王公、大人之家的典客者拜谒，投献行卷即卷轴。与王辟之的说法略有不同，多了奉币，少了笺即启。举子若得不到王公、大人的接待，过一段时间再重复进行一次，名为温卷，以示提醒。若仍然得不到主人接待，举子只好执卷轴找机会拦马自荐，曰："某人上谒者。"这条记载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唐人行卷情景，也说明行卷包括币、刺和"所为文"（即卷轴）。王辟之和项安世对温卷的描述稍有不同，行卷的内容和事项也略有差异。显然，举子在投献行卷即卷轴之前，需要准备书启、刺和币等三样东西，与卷轴一并投献，币虽然重要，但不能代表举子的才学，故可有可无。

以下通过相关实例来梳理唐人的行卷过程。举人行卷的第一个阶段——请见，需要"先投笺、刺"和卷轴。笺，在行卷中多称启，或启事、书，是举人投献行卷时，一起呈献的信，简要说明投谒的来意。如罗隐《投秘监韦尚书启》云：

> 某启。某月日，以所著《谗书》一通，寓于阍吏。某闻樊子昭之处屠沽，发光辉于许邵。郭林宗之游巩洛，振声价于符融……而尚书以盛名镇乎当时，以盛德传乎奕世……若某者，燎薪就学，掷槁攻文……是以重拂尘衣，聊希藻鉴。傥尚书以孺子可教，则随洛下之书生。傥尚书以斯人若狂，则访江东之钓叟。灵蓍神蔡，惟祷所从。谨启。③

请见阶段的启主要内容为：一是简单介绍自己投献的行卷即作品的名称和情况；二是盛赞先贤荐拔后学的典故，进而话锋转到将要投献的"先达"，大加赞誉其道德之高、学识之博和明鉴之盛；三是希望自己获得藻鉴，以及表达感激之情。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举子行卷时所谓的"刺"究竟是何物。权德舆《送钮秀才谒信州陆员外便赴举序》云："有秀才钮氏，以儒者衣冠访我于衡门之下，用文一轴与刺偕至。"④说明举人行卷时需要奉卷轴和刺。宋人费袞记录宋代行卷时云："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⑤虽然宋代与唐代有所差别，但亦可管窥唐代行卷之一二。所谓的"刺"，就是把姓名写在纸上，说明自己的身份，请典客递给"主人"，类似现代的名片。

"刺"的起源较早，汉代已有之。据《史记·高祖纪》云："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⑥司马贞《索隐》曰："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谷也。"⑦又

---

① （宋）王辟之撰：《渑水燕谈录》卷九《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119页。
②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4页。
③ （唐）罗隐撰，潘惠慧校注：《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293页。
④ （唐）权德舆撰，霍旭东校点：《权德舆文集》卷二九，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
⑤ （宋）费袞撰：《梁溪漫志》卷三《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⑥ （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4页。
⑦ 《史记》卷八《高祖纪》，第345页。

晋人郭颁《古墓斑狐记》云："狐不从，乃持刺谒华。"[①]说明汉魏以来士人谒见前贤、名公就须持刺求见。大概是"刺"比较短，又称"短刺"[②]。据北宋人孔平仲《孔氏谈苑·名刺门状》云："古者未有纸，削竹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③]说明"刺"后来改用纸来书写，故又称"名纸"[④]。又据南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十一《门状》云："古者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谓之'名纸'，至唐时李德裕为相贵盛，人务加礼，每通谒，改具衔起居，谓之'门状'。"[⑤]按照朱胜非的说法，"名纸"称作"门状"是在李德裕为相之后，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似乎包括姓名、头衔和起居。大概朱胜非是参考唐人李匡乂《资暇集》卷下《门状》的记载：

> 门状文宗朝以前无之，自朱崖李相贵盛于武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无以希取其意，以为旧刺轻（刺则今之名纸），相扇留具衔，候起居状。而今又益竞以善价纸，如出印之字。巧谄曲媚，犹有未臻之遗恨。[⑥]

显然朱胜非对门状的理解有些偏差。"门状"一般包括求谒人的姓名、具衔和恭候主人起居，即等候主人处分。

所幸的是敦煌文书保存了两件"门状"，一件为样文，一件为实用文书。伯3449号"参贺门状"载：

> 具衔厶
>
> 右厶谨诣台屏祗候贺，伏听处分。
>
> 云云。
>
> 并著年月日，向下具全衔厶牒。[⑦]

斯76号背"陈鲁修门状"载：

> 行首陈鲁修
>
> 右鲁修谨在衙门，随例祗候贺，伏听处分。
>
> 牒件状如前，谨牒。
>
> 长兴五年正月一日，行首陈鲁修牒。[⑧]

这两件门状分别为书仪样文和实用文书，正好可以让大家了解"门状"的全貌，说明门状包括了谒者的姓名、具衔、恭候起居语、请处分语、年月日、署名等。从门状的格式来看，门状最初是官场应用比较广泛的文书，被举人效仿，应该是从大中年间的进士薛保逊开始。据《北梦琐言》卷九《李涪尚书改切韵》载：

> 古之制字卷纸题名姓，号曰名纸。大中年，薛保逊为举场头角，人皆体效，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书云"谨祗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后。至今颠倒，无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⑨]

依据孙光宪的记载，大中年间举人用"门状"的时间与宰相李德裕在会昌中"名纸"改"门状"的时间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官场的习气很快影响到了科场，科场也将"名纸"改为"门状"。需要说明的是孙光宪"谨祗候起居郎某官"的说法似乎不实，从敦煌文书中来看，应该是"谨祗候郎某官起居"。

项安世所说的"币"，可理解为见面礼金。通常情况，举子在请见阶段还要奉币，即奉上礼物，贫寒举子囊中羞涩，奉币往往少得可怜，连打点主人家知客的钱都不够。如进士刘鲁风江西投谒所知，被知客所阻，因赋一绝句云："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万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肯通。"[⑩]又如唐末五代人欧阳彬投谒湖南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被樊姓知客索贿不得，没能见到马殷，于是写诗云："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

---

① （晋）郭颁撰：《古墓斑狐记》，收入（明）佚名编：《五朝小说大观》，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② （金）王若虚撰，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四五《贫士叹》诗云："试将短刺谒朱门，甲第纷纷厌粱肉。"（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页）

③ （宋）孔平仲撰：《孔氏谈苑》卷五《名刺门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④ 关于"名纸"、"门状"的研究，详见张小艳：《敦煌文献中所见"门状"的形制》，《文献季刊》，2004年第3期，第77-88页。

⑤ （宋）朱胜非撰：《绀珠集》，收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七二册，第493页。

⑥ （宋）李匡乂撰：《资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二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卷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⑨ （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8页。

⑩ （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6页；（清）曹寅等奉敕辑：《全唐诗》卷五〇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45页。

为通。”[①]可想举子行卷之艰难，恐怕要疏通像樊知客之流，就得花费一大笔钱，这是贫寒举子难以企及的，其名纸只好落个“生毛”的命运。当然，士族、小姓之家的子弟情况迥异，请见阶段奉启、刺之事，甚至遣家僮代为投献。如白居易行卷于给事中陈京，便是“遣家僮奉书”[②]。

进士若有幸得到接见，回头还须上启事，称为谢见。如罗隐《投郑尚书启》云：

> 某启。某前月某日，辄以所为《谗书》一通，贡于客次。尚书俯怜羁旅，遽赐沾濡。既受厚恩，则宜前去……尚书蕴稷契皋夔之事业，负卿轲迁固之文章。入则藻镜冰壶，品量人物……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归。发自门阑，百生知感。谨启。[③]

从罗隐的语气来看，应该是罗隐得到了郑尚书的接见，特意进启对其厚恩表示感谢，并对其百般溢美，称其“藻镜冰壶，品量人物”，颇有献媚之嫌。其《谢刑部萧郎中启》亦云：

> 某启。某伏以内揣荒芜，早乖投献。近者某官曲传尊旨，伏蒙郎中赐及卷纸，令写近诗。捧对优荣，莫知所处。某利非楚铁，钝甚燕锥……岂谓郎中俯敦吾道，欲堰颓波。不惮客朝，先从隗始。寓剡藤而下授，指巴句以旁征。荣异当年，事殊近俗。而况风流渐泯，翰墨难言……因使斯文，亦归清鉴。揣厚旨而时犹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宁惟元晏吟时，空增纸价。兼冀武卿窥后，免逐灰寒。谨启。[④]

从这件启的内容来看，应该属于请见之后的谢启。罗隐在此前已经获得萧郎中的接见，两人交谈甚欢，萧郎中甚至亲赐卷纸，令其书写近日所作诗，评价甚高。不仅如此，萧郎中还对罗隐的作品进行了点评，“俯敦吾道，欲堰颓波”，因此罗隐在这件书信中对其进行了回应，云“因使斯文，亦归清鉴”，表达了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心态，“揣厚旨而时犹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

宋人王辟之认为举人在谢见之后，还须再投启事，即温卷。不过，南宋人赵彦卫和项安世的说法与其不同，认为举子投献行卷之后，数日再投献启和卷轴，称为“温卷”。赵彦卫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⑤]项安世说：士人“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⑥]。赵彦卫和项安世所处的时代相近，所持说法也相似。若按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温卷似乎就是简单地把行卷再投一次。这与北宋人王辟之的说法，有较大差异。那么，究竟是哪种情形呢。据柳宗元《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云：“是以有前日之拜”，“是以有今兹之问，仰惟览其鄙心，而去就之”。[⑦] 显然，柳宗元此前向权德舆投谒卷轴，但迟迟未获得召见，故再度上启询问，更否给予召见机会，以便决定去就，说明王辟之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也说明“温卷”只有启，即启事，并不再重新投卷轴[⑧]。罗联添在谈到温卷之时，认为“所谓‘温卷’，亦未必如赵彦卫所云所业一投再投，而是呈献作品之后，再上书请对方温习所献诗文之意”[⑨]。此说是也。据《唐摭言》卷十一《恶分疏》云：“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苏郎中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请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苍黄复致书谢过。”[⑩]从此故事情节可知，进士苏拯与考功郎中苏璞为宗，起初想藉“叙宗党”之名，“既执贽”送了礼物，过了几天又想“以‘启事’温卷”，特意请乡人陈涤为其“启事”书写封缄，结果陈涤一时疏忽误书己名“涤”，犯了苏璞之父名涤的讳，导致苏璞大怒。此事正好说明，进士投献行卷之后，若未获得召见，需要再投“启事”即书启，此举亦谓“温卷”，而不是再投卷轴。如晚唐罗隐投献《谗书》之后，遇到没有回音情况，便再上启事，即所谓的“温卷”，表达拜谒殷切之情。属于“温卷”性质的启事

① 《全唐诗》卷七九五，第8956页。
②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四《与陈给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9页。
③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8页。
④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9页。
⑤ （宋）赵严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
⑥ 《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第274页。
⑦ （唐）柳宗元撰：《柳宗元集》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1页。
⑧ 参阅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25页。
⑨ 罗联添：《唐代文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⑩ 《唐摭言》卷十一《恶分疏》，第124页。

有:《谢大理薛卿启》云:"某启……中间辄以所著《谗书》,上干阁吏。"[①]又《投秘监韦尚书启》云:"某启。某月日,以所著《谗书》一通,寓于阁吏。"[②]又《上太常房博士启》云:"某启。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谗书》一通上献。"[③]又《投蕲州裴员外启》云:"某启。某月六日,辄以所著《谗书》一通,贡于客次。"[④]又《投郑尚书启》云:"某启。某前月某日,辄以所为《谗书》一通,贡于客次。"[⑤]显然,罗隐在迟迟等不到"先达"召见的情况下,反复进启事询问,盖此类书信即所谓的"温卷"行为。

若举子有幸获得先达召见,经过考察以后,如若获得欣赏,先达也会专门为之撰写"书谢",对其称誉、赞赏,达到为其延誉的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以奖拔后学著称,为举子延誉、称誉可谓不遗余力。如贞元中张籍"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⑥]。韩愈对其称赞不已,其《病中赠张十八》盛赞:"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蹋晓鼓朝,安眠听逢逢。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幸愿终赐之,斩拔桄与桩。从此识归处,东流水淙淙。"[⑦]这是贞元十四年(798),韩愈作汴州幕时荐送张籍(张十八)所作,张籍因此在次年进士及第[⑧]。又进士李翊曾投谒韩愈[⑨],获得韩愈接见和赏识,韩愈先后作《答李翊书》、《重答翊书》,不遗余力地为李翊延誉,称赞其"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并与李翊就"学道"问题进行了讨论,鼓励、提携之情溢于言表[⑩]。贞元十八年(802),陆傪佐主司权德舆于礼部,韩愈便推荐李翊[⑪],李翊是年及第,充分说明了韩愈对其器重,以及唐代举人行卷的效果。又开成中,项斯"声价藉甚",通过投谒,获得张水部籍的特别"知赏"[⑫]。张籍作《赠项斯》,诗云:"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借此为项斯延誉,此诗大概流传甚广,很快得到了郑熏少师的唱和,亦作诗云:"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⑬]显然,张籍不仅为项斯作诗延誉,而且到处为其请托。因此,项斯对张籍非常感激,在离别之际,也作《留别张水部籍》诗一首,云:"省中重拜别,兼领寄人书。已念此行远,不应相问疏。子城西并宅,御水北同渠。要取春前到,乘闲候起居。"[⑭]诗中体现了作者对张水部的依依不舍和感激之情,此诗即宋人王辟之所说的"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在张籍为项斯延誉之下,项斯声名渐起,会昌三年(843),"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杨甚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斯明年登上第"[⑮]。显然,项斯进士及第的重要原因是其以行卷投谒国子监祭酒杨敬之,并得到其"甚爱之"。杨敬之为了给项斯延誉,亲自赠诗一首,甚至用"到处逢人说项斯"来形容自己为其延誉之心切,大概是此诗用情至深的缘故,很快传遍了京师,项斯因此进士及第。

那些接到举子币、笺、刺和卷轴的王公、大人、文宗等先达,"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依据举子的名气、才学与身份,决定是否见面,若想见举子,则"出其书"召见。更多的时候,举子的卷轴很难得到先达的认真对待,往往是"有置之而不暇读者;又有默而视之,不暇朗读者;又有始朗读,而终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举子"进不敢问,退不

①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1页。
②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2页。
③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3页。
④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5页。
⑤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8页。
⑥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〇《张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04页。
⑦ (唐)韩愈撰,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⑧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第64页。
⑨ 李翊贞元十八年及第,其行卷于韩愈的时间可能在贞元十七年。
⑩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李翊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171页。
⑪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与祠部陆员外书》,第200页。
⑫ (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1页。
⑬ 《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第330页。
⑭ 《全唐诗》卷五五四,第6410页。
⑮ (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参阅《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第333-334页。

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①,只好小心翼翼,耐心等待。若是举子短时间内得不到先达接见,会再上启事请见。如罗隐《上太常房博士启》云:

> 某启。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谗书》一通上献。遂归逆旅,载轸危途。必恐员外以其姓氏单寒,精神钝滞,汩在众人之下,遗于繁务之中。某怀璧经穿,壮年见志……所以远辞蜗舍,来谒龙门……负所业以长嗟,向良工而有喟……今则火木相生,未测自焚之理。谨启。②

从此件启的内容来看,罗隐在此前向太常博士房某投献行卷《谗书》一通,便回旅店等候接见,大概是担心自己出身"单寒",而被遗漏,故又上启请见;其言语十分谦卑,形容自己是"远辞蜗舍,来谒龙门",以博取房博士的接见。

关于省卷作品的创作与卷轴的制作大体与行卷相似,也无投谒对象可供选择,省卷直接投纳礼部贡院,相关规定都比较明确,不再赘述。

二、延誉的方式与行卷效果

举子向所谓的先达投献行卷的目的,是要获得先达的赏识,为其延誉,激扬名声,帮助其获得科名。现实中举子行卷并非易事,并不是像元结作《文编》、皮日休作《文薮》为省卷和行卷,次年便进士及第,更多的举子是饱受挫折,通过百般努力才获得先达的延接,得到其延誉和推荐。

一般来讲,先达如对举子比较满意,便会为其延誉。为了确保延誉有效,可以在众多举子中脱颖而出,唐代先达为举子延誉可谓不遗余力,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如贞元九年(793),梁肃任右补阙,"是时,梁君之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③。即便是李观、韩愈、李绛、崔群等当时知名的文学新秀,也很难获得梁肃的接见。四人在未进士及第前,相互约定同进取,"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之面"。大概是四贤造访梁肃的次数实在太多,感动了梁肃,才获得梁肃延接的机会,于是"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④。很快,贞元八年(792)陆贽知贡举,梁肃向其推荐了李观、韩愈等八人,全部及第,史称"龙虎榜"。同年及第的还有王涯,其"博学工文,尤多雅思。梁肃异其才,荐于陆贽"⑤。像李观、韩愈等以文学著称的举人,在请谒以识才善知闻名的梁肃时,尚且三年始得延接,更何况普通举子呢!不仅如此,韩愈还"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馀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⑥。

继梁肃之后,韩愈很快成为文坛领袖,"有接后辈名"⑦,"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⑧。韩愈把荐拔后学视为己任,如元和中,进士李贺以诗歌谒国子博士韩愈,恰好韩愈"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当韩愈看到李贺行卷首篇《雁门太守行》之"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时,立刻"援带命邀之"⑨。后来,李贺果为韩愈所知,"名闻搢绅"⑩,可惜英年早逝。又如牛僧孺曾执行卷请谒韩愈、皇甫湜,受到二人的称赏。两人为了给牛僧孺延誉,颇费心思,趁牛僧孺外出,有意在其大门署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借此造势,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双贤专门造访牛僧孺,以便为其激扬名声,于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⑪。牛僧孺之所以能进士及第,还得到了当时名相韦执谊的赞誉。据《牛僧孺墓志》云:时相韦执谊见进士牛僧孺,"一见如旧,由是公卿籍甚,名动京师,得上第"⑫。韦执谊在贞元二十一年(805),由

① (唐)李商隐撰,(清)冯浩详注,(清)钱振伦、钱振常笺注:《樊南文集》卷八《与陶进士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页。

② 《罗隐集校注》之《杂著类》,第293页。

③ (唐)李翺撰,郝润华校点:《李翺集》卷一《感知己赋并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④ 《唐摭言》卷七《知己》,第81页。

⑤ 《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第420页。

⑥ 《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第4195页。

⑦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刘正夫书》,第206页。

⑧ (唐)李肇撰:《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⑨ (唐)张固撰:《幽闲鼓吹》,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0-1451页。

⑩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六《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9页。

⑪ 《唐摭言》卷六《公荐》,第63-64页。

⑫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二〇李钰《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06页。

吏部郎中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牛僧孺在同年进士擢第，与韦执谊的延誉有很大的关系。

继韩愈之后，张籍也以荐拔后学著称。张籍为进士项斯延誉，到了“逢人说项斯”的程度。为进士朱庆馀延誉也是如此。据《云溪友议》卷下《闺妇歌》云：

>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焉。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①

张籍亲自向朱庆馀索要新旧诗文，从中选取二十六章，随身携带，不失时机地在公卿之间“推赞之”。朱庆馀在参加省试之前，作《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一首，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②张籍作《酬朱庆馀》诗一首回之，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③在张籍的极力推荐下，朱庆馀不仅在宝历二年(826)进士及第，而且“诗名流于海内”。为此，朱庆馀曾作《上张水部》诗，云：“出入门阑久，儿童亦有情。不忘将姓字，常说向公卿。每许连床坐，仍容并马行。恩深转无语，怀抱甚分明。”④充分表达了对张籍感激之情。

除了与举人同游、造访举人、直接向公卿推赞、与之唱和之外，公卿、文宗等先达为举人的行卷、文集作序，也是为其延誉的一种重要方式。如皇甫湜的《送王胶序》⑤，梁肃的《送皇甫七赴广州序》⑥，权德舆的《送马正字赴太原谒相国叔父序》、《送陈秀才应举序》、《送独孤孝廉应举序》⑦，韩愈的《送王秀才序》、《送孟秀才序》、《送陈秀才彤序》等⑧。这些序中多为褒扬之语，意在向公卿、士大夫推荐这些出色的进士，也不乏寄予厚望之词。如韩愈《送权秀才序》云：

> 伯乐之厩多良马，卞和之匮多美玉，卓犖瑰怪之士，宜乎游于大人君子之门也……权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阅之累日而无穷焉。愈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若权生者，百无一二焉。如是而将进于明有司，重之以吴县之知，其果有成哉。于是咸赋诗以赠之。⑨

此序是韩愈作汴州宣武军幕僚时，“权自汴举进士京师，送以此序”⑩，说明此序是韩愈为权秀才的延誉之作。韩愈称赞其文词，“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自己“阅之累日而无穷焉”，足见文章之余味无穷，美不胜收；还特意强调权秀才的行卷是数以千计的举子行卷中优秀之作，“若权生者，百无一二焉”，可谓褒誉甚高。

举子请谒公卿、权贵、地方长官一旦成功，这些人也会不遗余力地为举子延誉，甚至以书信形式向其他重要人物推荐。如永贞革新之后，柳宗元被贬，后来改任柳州刺史，于是“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⑪。其中，有举人赵生慕柳宗元之名，专门跑到柳州行卷。柳宗元甚为感动，对其赞赏有加，极力延誉，不惜写书信向名藩推荐。如柳宗元《送赵大秀才往江陵谒赵尚书》云：

> 自吾窜永州三年，赵生亟见。视其状，专谨愿悫；观其迹，温密简靖；闻其言，径直端诚。自尚书理荆州，异政日至。至则赵生喜忭起立，伸目四顾，不啻若自己而为之者。诚

① （唐）范摅撰：《云溪友议》卷下，收入《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320－1321页；（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四六《朱庆馀》略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04页。
② 《全唐诗》卷五一五，第5892页。
③ 收入《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321页；《唐诗纪事》卷四六《朱庆馀》略同，第704页。
④ 《全唐诗》卷五一四，第5866页。
⑤ 《全唐文》卷六八六，第7025页。
⑥ 《全唐文》卷五一八，第5267页。
⑦ 《权德舆文集》卷二九，第411、424、426页。
⑧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第257－260页。
⑨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第276页。
⑩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第276页。
⑪ 《旧唐书》卷一六〇《柳宗元传》，第4214页。

宜有报知己之道，又诚宜有大贤而为之知也。是行也，赵生其将奋六翮，翔千里，以为辕门大府之重，增羽仪之盛，其道美矣。故予继之以辞。①

文中提到的赵尚书当是赵宗儒，元和四年（809）出为荆南节度使。柳宗元特意恭维赵宗儒，“自尚书理荆州，异政日至”，目的还是向其推荐举子赵生，希望荆南节度使赵宗儒“以为辕门大府之重，增羽仪之盛，其道美矣”，提携赵生，为其激扬名声。又如欧阳詹《送杨据见漳州李使君序》，称赞李有“天枝之英，金镜之明，盛物之量，秤物之衡”②。杨据携带这样一封书信，去拜谒李使君，李使君必然乐于延誉、推荐。

公卿、权贵和文场名流在为举人延誉的基础上，甚至会直接向知贡举主司推荐，帮助其获得科名。由于中晚唐科举考试兼采时誉，知贡举主司为了了解举子的时誉往往会“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③。科举考试中“通榜”的存在为举人行卷和公卿延誉提供了方便。据《唐摭言》卷八《通榜》载：“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郎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④也就是说梁肃识人善知的美名，实际上是因为“通榜”的缘故，梁肃对举子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到知贡举主司陆贽的意志，决定举子能否及第。又如贞元十八年（802），权德舆知贡举，陆修员外郎与其“通榜帖”，韩愈向陆修推荐十人，其上为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四人，其次为张弘、尉迟汾、李绅、张俊馀六人，权德舆连知三榜，“共放六人，而弘、绅、俊馀不出五年内，皆捷矣”⑤。此条记载中有关“通榜帖”的说法未必属实，但像陆修、韩愈等公卿和文场名流对举子的评价和推荐直接影响其科名的成败是不争的事实。

总体来讲，唐代举子行卷，有利于士族、小姓子弟，特别是京畿地区的士族和权贵子弟以“京畿便利”，“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⑥。由于“京华之地，衣冠所聚”，聚集了大量的高官显贵、文化名流，方便举子投刺干谒，驰驱要津，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为其行卷、延誉、登第提供更多的机遇。唐代京兆府的“京兆解”前十名等同及第，时谓“等第”，甚至称为“神州等第录”⑦，其高登第率吸引了天下举子竞趋京兆府取解。因此，为了求谒、行卷方便，外地举子往往想方设法寄应京畿。甚至恃门望以自居的山东士族，到此时“虽清望标门，崇冠山东之族；而丹心恋阙，耻为关外之人”⑧。以至于晚唐，“近以亲族相依，友朋见处，卜邻上国，移贯长安”，往往是“俄沾厚赐，衣裾轻楚，匹帛珍华，负荷不胜，推让何及”⑨，以便子弟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方便行卷，以期在科场上占得更多的先机。

中晚唐的“呈榜”制度也为举子行卷开了方便之门。如宜春进士卢肇，曾经在李德裕左宦宜阳时，“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来每次参加省试，都要去谒见李德裕。终于在会昌三年（842），王起知贡举，问宰相李德裕所欲，答曰：“安问所欲？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王起竟然依次放三人进士及第⑩。大概是李德裕亲身经历“呈榜”的弊端，故后来秉政时极力主张废除“呈榜”制度，但牛党执政后“呈榜”制度又得以恢复。晚唐牛党完胜，主控朝政后，科场的主导权也由牛党掌控，以杨虞卿等“三杨”为代表的牛党党魁和骨干与科场朋甲相结合，导致天下举子纷纷奔竞于“三杨”之门。举子行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科场公平，于是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子只好“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⑪，到处行卷，却得不到举荐，只落个贫困潦倒、老死科场的命运。

不过，唐代社会无论是中央公卿，还是地方刺史、县令，或是文化名流、文宗，对举子的投谒、行卷等行为比较重视，多能以礼相待。举子行卷于公卿，与公卿举荐为其延誉在某程度上存在相互

① 《柳宗元集》卷二二，第609页。
② （唐）欧阳詹撰：《欧阳行周文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③ （宋）洪迈撰：《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69页。
④ 《唐摭言》卷八《通榜》，第82页。
⑤ 《唐摭言》卷八《通榜》，第82页。
⑥ 《通典》卷十七《选举典五》，第412页。
⑦ 《唐摭言》卷二《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第13页。
⑧ 《白居易集》卷五七《答卢虔〈谢赐男从史德政碑文、并移贯属京兆表〉》，第1214－1215页。
⑨ 《樊南文集补编》卷六《上河阳李大夫状一》，第692页。
⑩ （唐）缺名撰：《玉泉子》，收入《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422页。
⑪ 《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第274页。

依存的关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论述这一相互依存关系，云："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①因此，若是公卿、权要慢待举子，也会招来举子的批评和指责，从而影响自己的清誉。如中唐李观曾经因为故旧关系投谒先辈孟简，遭其怠慢，引起了李观不满。于是，李观作《贻先辈孟简书》，历数其不是，云：

> 仆每怀殊节，不履常迹，立名委运，求友胜己，是以昨昼徒步，奉寻所居……如何称倦哭泣，辄安床褥，辞以有疾，坐而诬我……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之称尔？大丈夫当立天下，何取辱于足下之门？嗟乎李生！斯过也矣。且仆相造重足下，足下非礼见辱。②

李观作为中唐才子，声名籍籍，受到先辈孟简的慢待，便致书历数其不当之处，与其论道，与多少举子卑言微词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像李观、项斯、朱庆馀等非常幸运地遇到梁肃、韩愈、柳宗元、张籍等识才善知的伯乐情况只是少数，举子更多的时候行卷无门，或者行卷石沉大海。《唐摭言》卷十二《轻佻》云：

> （郑）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噱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而罢。③

郑光业虽然进士及第，但无提携后进之心，反而把不中意的举子投谒行卷随意投入大皮箱内，戏称"苦海"，足见郑光业之流对待举子行卷的轻浮态度。又如晚唐李商隐所云，所谓的先达对待举子行卷，"乃复有置之而不暇读者；又有默而视之，不暇朗读者；又有始朗读，而终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④，真实地描述了举子行卷的不同命运，举子得到延接的是少数，获得延誉和奖拔更是少之又少。多数举子只能"进不敢问，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面对如此公卿、权贵和文化名流，真正能获得荐拔者多为京师士族、小姓子弟，那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小姓和寒素获得见知和荐拔的机会可想而知了。贫寒举子"所至之门，当关迎嗔，俯眉与语，受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开口以延乎？"⑤相反，官僚子弟"所至之家，入去如归，阍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开读，喜欢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户，口口附和，不敢指破。亲朋扳联，声光灿然，其于名达，进取如掇"⑥。显然，行卷为士族、公卿子弟提供了方便，对小姓、贫寒子弟不是很公平。

结语

总之，唐代科举省试，在考试基础上，知贡举主司往往受"公荐"和"通榜"的影响，兼采举人的时誉，而举子时誉的大小取决于公卿、文宗、前辈乃至朋甲的延誉和清议。举子获得延誉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行卷来实现，因此，举子的行卷效果往往决定其功名的成败，于是举子纷纷执卷轴干谒于公卿、权贵之门，希望获得先贤延誉与举荐。尽管唐代举子在行卷过程中非常注重仪礼，在卷轴之外，备启、刺（门状），奉币投谒，讲究请见、谢见、温卷和叙谢等各种仪礼，以示对先达恭敬之情和投谒之诚意，以期获得延引和延誉；但像李观、韩愈、项斯、朱庆馀、牛僧孺等进士，顺利获得延接、延誉，因此声名大振，从而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更多寒素、小姓和落魄士族子弟要么朝中无人投谒无门，要么囊中羞涩无力支付行卷费用，只能默默无闻，老死文场。唐代行卷总体而言，有利于士族、小姓子弟，特别是京畿地区士族和权贵子弟。由于"京畿便利"，聚集了大量的高官显贵，方便投刺干谒，驰驱要津，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为其行卷、延誉、登第提供更多的机遇，"从容附会，不劳而成"。

（责任编辑：仲平）

①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201－202页。
② 《全唐文》卷五三三，第5414页。
③ 《唐摭言》卷十二《轻佻》，第140页。
④ 《樊南文集》卷八《与陶进士书》，第442页。
⑤ 《全唐文》卷七九五《骂僮志》，第8337页。
⑥ 《全唐文》卷七九五《骂僮志》，第8337页。